

华侨投资与广州城市近代化研究

◎武文霞

摘要: 华侨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多领域、多维度地推动了广州城市近代化进程。经济上,投资近代工业、金融、商业等领域,促进了广州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方面,不仅在发展理念、交通变革等方面影响了广州近代城市建设,而且投资房地产,拓展了城市发展地域,推动了广州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在广州近代化历程中,华侨资本大量进入广州,资金回报率高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吸引华侨投资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华侨投资;广州;城市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562(2023)04-0052-07

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历程中,华侨投资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近代化进程,推动广州由封建性商业城市向近代新型城市转型,城市功能与城市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华侨投资和海外资本注入的刺激下,广州新设工厂不断增多,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近代工业体系,商贸和金融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区域不断扩大,交通体系不断完善,近代城市空间格局逐步形成。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载体,城市近代化与城市化属同一历史过程,只是表述上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城市化侧重于探讨全国或区域城市体系中,人口在不同城镇中的分布、密度,城镇的社会经济类型、产业布局以及城镇之间的社会经济的联系;而城市近代化则侧

重于指某一具体城市结构、功能方面的近代化过程^[1]。本文所探讨的华侨投资对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影响,主要从城市经济、交通发展、城市格局和社会生活观念等方面,探讨华侨投资在广州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华侨投资对广州城市近代化的作用

20世纪前后,华侨的投资是中国国内产业资本的来源之一^[2],广州作为重要侨乡,吸收了大量侨资。华侨投资广州近代工业、交通、金融、商业等领域,不仅改变了传统城市产业结构,而且推动了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系统也不断完善,城市区域逐渐向周边拓展,广州城市近代化速度明显加快。

(一) 近代工业发展逐渐崛起

收稿时间:2022-04-19

基金项目:《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助专项“海外华侨华人与广州城市近代化研究”(2018GZY06)。

作者简介:武文霞,女,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635。

工业发展在城市近代化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个城市近代化程度主要取决于工业发展。19世纪中期以来，以华侨为代表的一批商人，先后投资缫丝、火柴、造纸、电力等部门，为广州近代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带动了广州兴办实业的风气，推动了广州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壮大。以橡胶工业为例，南洋、美国、日本等区域的华侨，在广州先后创办了许多家生产胶鞋、拖鞋、运动鞋、自行车轮胎的胶厂，推动了广州橡胶制鞋业的发展。在华侨投资的带动下，广州橡胶制鞋业发展很快。1936年，先后出现了百余家橡胶鞋业家庭作坊，多进行胶鞋半成品加工，产品以胶鞋为主，品种达10多种，生产量从1931年的80万双发展到1010万双，生产设备也从20世纪20年代平均每间厂拥有炼胶机1.7台增加到3.1台，行业人数发展到4200人，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3]。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不断提高，加之就地经营，使远渡重洋的舶来品逐渐失去了市场”^[4]，奠定了我国橡胶工业发展基础。再以火柴厂为例，1914年到1922年，广州地区有火柴厂14间，占全省火柴厂的80%，其中属于华侨资本的就占85%^[5]。这些侨办火柴厂不仅加速了广州火柴工业发展，而且改变了过去“洋火”充斥国内市场的局面，除满足本省各市、县使用外，还销往很多邻近省份，以至远销东南亚很多国家。

华侨投资建设的工厂无论是在管理方式和雇佣制度方面，还是在技术水平与生产规模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于传统手工作坊，不仅推动了以广州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而且推动企业经营与管理日趋近代化。在华侨投资和资本注入的刺激下，广州新设工厂不断增多，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近代工业体系，使广州传统手工业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生产，推动了广州近代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二）金融、商业和外贸等领域快速发展

1. 广州金融业务范围不断扩展

金融是连接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命脉，不仅可以吸收社会闲散资金，而且有利于市场融资，有利于实现资金和财富的再分配，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发展过程

中，华侨投资广州金融业主要体现为侨批业和银行业。

侨批业主要经营侨汇业务，很多华侨投资经营这一领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期间指出，“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当时经营侨批业的机构有德昌行广州分号、侨商庄、人和镇幸福会华侨通讯处等，这些机构见证了华侨不忘家乡亲人的家国情怀，不仅将祖籍地与海外华侨联系起来，而且大量侨汇流入广州，为广州近代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虽然侨批的资本和业务不能和银行相提并论，但也经营存款、汇兑、买卖外币和外汇等业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推动了广州金融业的发展。

同时，海外华侨也投资创办了很多银行，为广州近代经济注入了发展活力。除广东地方实业银行、中央银行及广州市立银行等外，其余绝大多数是华侨开办或商绅开设。1918年，薛仙舟和林天木向旅居美国及加拿大各地华侨集资，在广州市开办工商银行；1919年，美洲和南洋华侨合办广东银行，资本达到330万元^[6]；还有南洋华侨集资在广州创办的华侨联合银行广州分行，日本华侨简东浦与香港太平绅士周寿臣（早期留美学生）创立的东亚银行，等等。这些银行不仅办理侨汇和储蓄，业务还扩展到代收票据、票据贴现、发行汇票等方面，这也是广州金融业近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体现。

20世纪以来新成立的银行采用了近代管理制度，其业务范围广泛、经营方式日趋先进，逐渐向近代金融机构转型发展。20世纪30年代，广州金融发展居于全国前列，1936年广州在全国九大金融都市中名列第四位^[7]，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国内金融发展，而华侨资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1931年广州市政府统计，全市有银行、银号540家，资本700万元，华侨资本占一半^[8]。可以说，在广州近代金融市场发展上，华侨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发展理念，还是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推动了广州金融市场的近代化转型。

2. 创新传统商业经营模式——开办百货公

司、兴建酒店

商业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提出“以实业和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海外华侨纷纷响应，积极投资广州商业发展。20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在广州长堤大马路创建先施公司；旅居澳洲的华侨蔡兴、蔡昌兄弟在广州创设大新公司。这些百货公司率先采用明码标价、分柜售货、开票收款、发放礼券等措施，商品种类新颖繁多，服务环境较好，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为广州商业发展注入了一股活力，其资金、技术水平、生产规模、雇佣制度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旧有的手工作坊，实施以商业带动实业的发展策略，带动周边大小商店纷纷成立，推动了广州百货商业达到民国时期最高水准^[9]，创新了中国商业经营模式，掀起了中国现代百货革命的浪潮。

此外，华侨以集股形式在广州兴建了很多现代化酒店，如大同酒店、新华酒店和新亚酒店等。这些酒店代表了近代中国酒店的最高发展水平，推动了广州酒店的国际化发展。“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10]。广州城市商业的发展进一步瓦解了本地自然经济，城市传统商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力度逐渐向近代转型。随着城市金融业、商业的兴起，商品流通渠道和商业营销体系不断完善，广州城市商业网络日益成熟，逐渐发展为全国规模较大的华南商品交换中心和批发中心。

3. 推动广州对外贸易发展扭转颓势

“五口通商”以后，广州对外贸易额日渐萎缩，逐渐失去了外贸优势。外贸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取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受到较大影响而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直到1865—1894年期间，才逐渐缓慢回升^[11]。其中，华侨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侨出洋经商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扭转了广州外贸总值下降的趋势。

海外华侨对广货有着强烈需求，华侨喜欢食用中国大米，每年都有大批中国大米从香港运往美洲等地，以满足当地移民的需要。输出南洋一带的货物，也多为专供华侨需用的药材、爆竹、纱绸、土纸、海味等品，其总值亦颇大，占粤省

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输往香港的贸易总值^[12]。同时，海外华侨以粤籍居多，其对日常之用品，尚有嗜好广东货之习惯，故每年广东货品之供给华侨消费者，总值在1亿元左右，此乃华侨推销国货、助长贸易最明显之事实^[13]，故而也推动了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中国人是整个东南亚国际贸易商的大中人，进口货物要先经过他们才能到达内地消费者，出口货物也先由他们买下才转售于出口商人”^[14]，华侨经营进出口货物推动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广州自古就是一个外贸城市，以贸易兴市，外贸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广州城市近代化受到外力的巨大影响。随着华侨出洋经商的发展，广州也逐渐发展为近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推动了近代商品经济体系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广州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提高了广州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公共交通建设与发展不断完善

辛亥革命前，广州作为华南最繁华的商业之地，全城的公共交通除了轿子，就是人力车，制约了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这时候，华侨投资交通行业，极大地便利了广州市民的出行，推动了广州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

首先，机动车方面，马来西亚归侨从香港购进了几部旧汽车，开始在广州运营。这是广州市使用机动车的开始。随后，广州市的机动车不断增加，1928年，机动车数量增加到400余辆，1931年已经超过1000辆^[15]，市民生活出行更加便利。其次，公共汽车方面，1932年，市内多家公共汽车公司拥有汽车96辆，其中华侨投资的就有56辆，占58%^[16]；至1935年，广州已成立了13家公共汽车公司，其中侨资承办的汽车公司已有11家^[17]。此外，华侨还投资专营汽车修理、装配零件的公司。

华侨投资近代公共交通以后，广州市内和市郊的交通大为改观，由过去的轿子、人力车逐渐过渡到汽车，极大地推动了广州近代交通的发展变革。公交运营线路不断增加，公共交通系统更加完善，近代城市空间功能不断优化。

（四）城市发展格局逐渐拓展

20世纪以来,近代工业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繁荣,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兴旺,大量华侨投资房地产,扩展了城市地域范围。广州城市空间布局和结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城市的发展格局。

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一个显著现象,是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特别大,无论是在投资户数、投资数量,还是所占据比重等方面都很大,而且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投资^[18]。华侨大量投资广州房地产,以至砖、瓦、木石等建筑材料一时求过于供,价格突飞猛涨,依靠大量进口来填补。“广州港水泥大增,由上年47167担升至87936担,玻璃片进口由上年44622丁方尺升至71441丁方尺,皆因省城内外建筑新式屋宇及各项工程甚多,而销场更广”^[19]。1923—1937年15年间,华侨在广州市投资的侨房约有7000多座,投资金额达到9000万美元^[20]。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华侨在广州购地置业的规模。

华侨之所以投资房地产业,固然与老一辈华侨“落叶归根”的念头有关,汇款回家乡购置房产,以备自己还乡养老,而投资房地产利润比较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人口增长很快,对房屋需求量较大,而且置业利息最低为八厘到一分,最高的一分以上,而以实业资本为周转的银行利息却低二厘到一厘^[21]。华侨企业家们认为,“炒地皮有利可图”,“土地经过几次转手,价值增了三四倍”^[22]。可见,投资房地产收益较大,不仅高于银行的利润,而且也高于民营工业。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华侨大规模投资广州房地产,推动了城市区域的开发,引入西式风格的建筑设计,丰富了广州建筑风貌的国际化元素,也奠定了广州近代城市的发展格局。

(五) 市民休闲娱乐生活增多,生活观念发生转变

衡量传统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社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23],广州市民对电影等新事物的接受,意味着他们冲破了传统社会观念,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向近代转型发展,不仅增加了新内容,而且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华侨投资的广州服务业中,占首位的是影院

业,很多美籍华侨相继投资了电影、戏院项目,兴建了戏院、电影院等休闲设施。当时,大多数广州戏院是由华侨投资或者合资经营的^[24],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主要影剧院,几乎都有华侨的股份^[25]。这些休闲设施的兴建,不仅传承了传统戏剧文化,增加了新的文化内容,而且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华侨把西方电影传入广州,增加了市民消费文化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市民的精神生活质量。在华侨的影响下,广州市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方面,还是思想观念、生活态度和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那种消费单一的生活方式,日益为新型的多样性的消费模式所替代,从而逐步形成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丰富业余生活为主调的消费娱乐文化^[26],市民消费生活的选择性日益多元。这些新兴的戏院和影院等设施,激发了市民的消费欲望,深刻影响了广州市民的生活格调和心态世界,体现出追逐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特点,广州城市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日益向近代转型发展。

二、海外华侨投资广州建设与发展的原因探讨

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历程中,华侨资本大量进入广州,资金回报率高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吸引华侨投资的重要因素。

(一) 交通便利,社会稳定

广州地处珠江口北缘,南濒大海,毗邻港澳,连接珠三角,既是岭南与中原及域外交往的聚集地,也是三江货物的聚散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7],交通便利,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初期,广州市区马路迅速发展,临近各县的郊外公路也逐渐打通,全省以广州为中心,分布在省内的17条主要公路线和326条支线,修建公路的总长达4000多公里,这个里程数在全国各省排列第一^[28]。1921年先开辟省内的长途汽车运输线,随后逐渐扩展并伸向外省,到20世纪30年代,已形成省内及省际的

公路长途运输网，广东全省1934年8月时的公路总长约为17880公里，居全国第一位^[29]。随着各公路干线的开通运营，1934年，全市的15家官营和私营长途汽车公司有1278辆长途汽车投入营运^[30]，总长17880公里的公路，分为“省道、县道、乡道数种”^[31]。同时，广州铁路交通、水上航运和航空线路发展也比较快。广三路、广九路均与粤汉路接轨相通，广州作为铁路交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32]。1932年，广州港务局设立，开设24条航线，与广州通航的珠江三角洲的县达11个，占全部市县总数的64%。此外，在西堤建立了西南航空公司，沪粤线等5条航空线于1932年全部通航^[33]。20世纪30年代，以广州为中心的陆路、水路和航空立体交通网逐渐形成，广州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促进了物资交换与对外贸易发展，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华侨资本。

此外，与周边侨乡相比，广州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吸引华侨资本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期，广州社会环境稳定，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是当时华侨积极投资的重要原因。1929年陈济棠上台后，大力发展经济，“澄清吏治，发展交通，进一步公共社会治安，为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34]。而邻近的台山、开平等侨乡，匪患较多，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程度威胁，时常受到土匪的抢劫与迫害。故而，近代华侨投资广州市的金额比较大，折合人民币约为145112750元，占广东省的37.5%^[35]，为三分之一强。可以说，广州稳定的社会治安，为吸引华侨投资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

（二）政府吸引侨资，提供优惠措施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颁布了保护华侨法令，对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置业定居给予保护和优惠照顾，极大地鼓舞了华侨投资广州建设的热情。1923年12月，孙中山以广东陆海军大元帅身份宣布成立广州侨务局，并兼任局长，鼓励华侨回国置业。在1933年提出的《关于扶植商务以吸引侨商投资实业提案》中，指出“华侨投资之热心与毅力，是诚发国内经济，救济百业之要着也……厘订奖励及保障侨商投资实业办法，切实施行”^[36]，积极鼓励华侨投资广州经济建设。

在税收方面，“豁免地方一切苛捐杂税，使华侨投资经营事业，不至多所顾虑”，并成立华侨投资指导所，为华侨在广州投资实业提供咨询业务^[37]。华侨子女教育方面，规定任何一间学校“应一律免其学费，俾华侨踊跃回国之心”^[38]，以解除华侨回国投资的顾虑，华侨投资广州建设的热情大为增加。

（三）广州近代市政建设发展需求

20世纪初期，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体系，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910年，广东省垣警界区域人口达517596人^[39]，城市人口不断增多，也推动了市政建设的发展。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决定拆墙修路，拓宽市区马路。这是近代广州第一个大的市政建设工程，城墙的消失意味着广州传统的城市形态机理不复存在，标志着广州城市发展突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完成了城市形态在地域上的近代转变，这一转变对华侨资本有着巨大的发展需求。

1921年，广州市政公所改组为广州市政厅，规定“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40]，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成为中国第一个城市型的政区。孙科出任广州市市长后，率先实行市政改革，致力于市区的马路拓宽与建设，对城市规划和建设更加重视。“自建设市政府以来，十有余载，百废俱兴，市政成绩，突飞猛进，其所成就最为易见者，为马路居多，盖以一旧式中国城市，蜕化成新，其先决问题，厥为开路，路政解决，交通便利，然后各部推行，迎刃而解也”^[41]。所以，广州市区马路建筑速度很快，数量非常多，城市建设多维同步推进。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华侨投资房地产是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华侨房地产业的全盛期恰好与“国民党政府期间广东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吻合^[42]。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华侨资本的进入，广州市政建设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近代化转型。

三、结语

近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文明发展趋势，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性^[43]。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发展逻辑，近代中国城

市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变革所产生的推动力的双重影响下的特殊发展模式^[44]。广州城市的近代化并非传统城市的自然发展,广州开启近代化发展历程也受多种因素推动。其中,海外华侨在广州城市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想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带着资金、设备和技术回国办厂,投资广州诸多领域,推动了广州的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广州作为世界上近代化的后发城市,华侨投资对城市近代化影响巨大。一是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资本、技术、贸易、信息等通过华侨引进来,促进了广州近代工业的发展,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金融与商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推动了广州城市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障了广州在近代城市化中居于全国前列,影响了城市近代经济发展格局。二是推动了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华侨引入的新式交通工具,改善了城市公共交通条件,促进了近代交通的发展;投资房地产不仅拓展了城市发展地域,而且打破了传统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优化了广州近代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三是电影和戏院等丰富了市民休闲娱乐方式。华侨投资影院,将海外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带入广州,不仅影响了民众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引领了广州的休闲文化潮流。所以说,海外华侨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在物质和技术领域,催生了新技术、新业务,而且在思想观念和社会习尚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广州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拉近了广州与世界城市近代化发展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45]。在广州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华侨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这一资源优势,以侨引资、以侨引智,鼓励海外侨胞参与广州城市建设,助力广州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桥头

堡,进一步推动广州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沈松平.城市近代化和晚清士绅的嬗变与重构——以江浙地域社会为例[J].浙江学刊,2001(05):137-140,183.
- [2]许涤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27.
- [3]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八,华侨志·穗港澳关系志[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166.
- [4]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225.
- [5]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筹备组.名城广州[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161.
- [6]林金枝.论近代华侨在广州的投资(1862—1949)[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01):29-37,28.
- [7]余定义.现阶段之中国银行业[J].中行月刊,1936(2):29-42.
- [8][17]丘传英.广州近代经济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239,79.
- [9]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010.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1.
- [11]刘圣宜,王燕军.抵抗与吸收——广州近代开放史话[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1.
- [12]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11.
- [13][14]黄文袞.华侨与广东经济[J].社会科学,1937(1):18-25.
- [15]粤闻[N].香港华字日报,1931-4-14.
- [16]傅崇兰.广州城市发展与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22.
- [18]楨淳.华侨早期投资之首:房地产业[J].侨园,1998(02):38-40.
-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81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593-595.
- [20]朱森林.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侨务工作的重要性[J].广州华侨研究,1987(7):2.
- [21]陈炳.二十世纪华侨对广州建设的投资[J].羊城今古,1988(2):14.
- [22]雷麦.外人在华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39.

- [23][24]高翔. 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2000(04):178-189,208.
- [25]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 广州:广州经济年鉴[M]. 1984:67-70.
- [26]张富强. 广州商业文化的近代化及其特点[J]. 学术研究,1996(03):50-52.
- [27]姜建红. 汉代广州与海上丝路——探究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J]. 人民论坛,2012(02):138
- [28]刘琼琳. 广州近代商贸建筑研究[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178.
- [29]周兴樑. 广州建市及其早期近代化发展概况与启示[J]. 中国名城,2021,35(12):75-80.
- [30]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政府新署落成纪念专刊[Z]. 广州:广州市政府,1934:90.
- [31][36]广东省档案馆. 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M]. 广州: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5:291,180-181.
- [32]周兴樑. 陈济棠治粤与广东的近代化建设[J]. 中山大学学报,2000(6):64-72.
- [33]陈炳. 二十世纪初期华侨对广州的投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3):34-38.
- [34]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97.
- [35]林金枝.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J]. 南洋问题研究,1978(01):4-24.
- [37][38]广东政府周报,221,334.
- [39]赵世瑜,周尚意. 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J]. 史学月刊,2001(02):112-119.
- [40]广州市暂行条例[N]. 民国广州市市政公报,1921-2-28(1).
- [41]程天固. 广州马路小史[Z]. 广州:广州市档案馆藏,1928:98.
- [42]李杨.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华侨为何聚资于房地产[J]. 学术研究,1986(1):69-73.
- [43]江沛. 留日学生、东游官绅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J]. 史学月刊,2005(5):56-66.
- [44]何一民. 中国城市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466.
- [4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EB/OL].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xijiping/2017-11-29/content_41995619.htm. 2017-11-29.

责任编辑:张颖

(上接第44页)

- 广州市委组织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商务局、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10个部门发文正式发起,并于当月同期开班;2023年4月,“新时代穗商培养工程”首期学员顺利结业,第二期正式启动。
- ② 相关数据出自广州市工商联《关于“新时代穗商培养工程”第一期开展情况的总结报告》及问卷调查报告。
- ③ 2013年5月起,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简称“四信”)为主要内容,对“两个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
- ④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中办印发《意见》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N]. 人民日报. 2020-09-16(1).
- [2]习近平.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 人民日报. 2015-05-21(1).
- [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460-470.
- [4]郭伦德. 中国共产党的民营经济政策发展历程研究[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03:46-49.
- [5]俞正声. 弘扬企业家精神 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N]. 人民政协报. 2017-05-31(1).

责任编辑:张颖